

州爲最。東南沿海則閩、浙米價更比蘇州爲貴。三、無論就米價的季節性差異觀察，或區域間價格水準的差異觀察，十八世紀前三分之一的期間我國糧價相當穩定。四、當時糧價的穩定當歸功於三個因素：一爲水上運輸效率高；一爲政府穩定糧價政策的有效，例如：利用常平倉春糶秋糶、截留漕糧以濟缺糧省分、撥官款至剩糧地區採購等；一爲沿着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各地區間大宗米糧貿易的發達。

在上列三種因素中著者認爲當時區域間大宗米糧貿易的存在，對於穩定米價貢獻最大。因爲政府所掌握的糧食，和當時各地產銷總額比較起來，究竟微小。即使政府行政效率很高，難免杯水車薪。所以最主要是靠米商的購運，從米糧生產有剩餘的地區如四川、湖南、江西、安徽等大量採辦，輸運到缺米的東南沿海。長江流域水運便利，順流東下，減少運輸成本，因而也縮小各地間糧價水準的差異。著者對於各地米糧供需的分析和米糧貿易的探究，大大地增進了我們對於清中葉經濟的了解，貢獻殊大。然而，他們對於貿易量的估計，幾乎全靠間接材料如人口、產米量、每人消費量等，輾轉推求而得。而這些間接材料的可靠性尚有審察的必要，所以這種估計究竟和實際情況如何接近？仍是問題。顯然地，商人活動及其對於當時中國經濟的貢獻，諸如米商幫別、組織、運銷額、官商關係等等，都亟待研究。全教授和克勞思博士這本著作給我們在這方面開拓了一片極有價值的領域。

總之，無論內容或方法上觀察，這是一部堅實之作。作者剖析盛清糧政和南方各區域間的經濟交流，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書中對於材料的考察，立論求證，分析推理，都可爲研究經濟史者作楷模。筆者認爲，他們已把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往科學探討的途徑上邁進一步。

王業鍵

美國肯特大學

*Historical Notes on Hôï-An (Faifo)*. By Chingho A. Chen.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Monograph Series IV, 1974. vi+164 pp.)

越南南圻堤岸 (Cholon) 爲華僑商業及僑居之中心，人所共知。惟堤岸之建置，不過在十九世紀初年，而在十七世紀初葉，南圻尚屬一片荒野時，廣南 (Quáng-nam) 之會安 (Hôï-An) 已成爲中圻之首要商港，華船通販之要津。當地商客聚居，有唐人街之

設，繼後日益發展，儼然華埠，乃越南中圻早期華人社會之典型，故有志研究越南近代華僑史者，莫不致力探索會安華人社會之概況及其變遷也。

作者陳荆和教授在一九五八至六二年間，應邀任越南西貢大學、順化大學及大南天主教大學訪問教授。一九六〇年時，更得越南考古院之助，進行廣南省會安古蹟調查工作，考察有關會安華僑遺跡，包括會館、寺廟、祠堂、墳墓等，鉅細無遺，蒐集得不少寶貴史料。而本書《會安史要》之撰寫，乃取材當時搜羅所得之原始資料，故內容當屬信而有徵。

全書共分四章及附錄。第一章為歷史背景：作者首先解釋廣南地區之定義，廣義而言，乃指十六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之末，在阮主統治下為時超過二百年之「廣南國」領土也。阮主最強盛之時，領土包括今越南中部及南部，時歐人稱之為「交趾支那」；日、華海客則稱之為「河內國」或「廣南國」焉。至於狹義之廣南，乃專指阮主轄下之廣南省。

繼而作者縷述越南各朝歷史之演變甚詳。大越陳朝自一三〇六年（元大德十年）始，銳意拓展南疆，用和親政策，獲得占城國主相贈順、化兩州。及權臣黎季犛篡陳，國號大虞。大虞於一四〇二年發兵攻占城，奪去升、華、思、義四州之地，相當於今日之廣南省與廣義省（Quảng-ngai），會安亦隨之易主，改隸越南矣。

大虞國治越僅七年，終亡於明朝，淪為屬地。一四二八年土豪黎利起義，逐走明人，重建大越。黎聖宗於一四七〇年揮軍討平占城，將占城北半收為直轄領，其南半則分立土侯，收為藩屬。

黎朝數傳至威穆帝，政治敗壞，為權臣莫登庸所篡。未幾，黎朝遺臣阮淦擁立黎莊宗於哀牢，並得哀牢王之助，與莫軍相持不下。一五四五年阮淦被暗殺，其婿鄭檢當權，代領兵馬。

黎朝權貴阮、鄭二家反目成仇，造成政治危機。幸而阮淦之子阮潢深明大義，一五五八年自願率同鄉黨義勇南遷，鎮守順化（Thuận-hoa），目的在逃避姊夫鄭檢之政治壓力。阮潢之南遷順化，致力經營廣南，引致日後越人大事拓展南疆及華人大量移殖，意義不凡，為越南近代史另創新頁。

鄭檢死，子松繼遺志，矢誓復國，經過五十年爭戰，終於一五九三年（明萬曆廿一年）擊敗莫氏，光復昇龍（Thang-long 即今河內），迎世宗還都，而黎朝亦告復國。

及阮潢卒，子福源繼任鎮守，因傾向獨立自主，為鄭氏所不容。一六二七年（明天啓七年），雙方爆發內戰，形成鄭、阮二主南北對立之局。戰事連續四十餘年之久，至

一六七二年（清康熙十一年），雙方始同意以廣平省（Quảng-binh）北之灑江爲界，協議停戰。南方阮氏此後稱主、稱王，實際成爲獨立國家，此即我國所稱之「廣南國」，歐人所謂「交趾支那」也。

第二章爲會安之開港及其貿易發展：明朝穆宗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解除海禁令，明商民獲准出洋至南海一帶互市，至於通販日本仍在嚴禁之列。結果促使日本當國者繼續頒發所謂「御朱印狀」與日本豪商，鼓勵彼等派船至中越之會安，（按會安位於廣南城東約八公里之秋盆河畔，爲廣南省首要門戶，中圻主要貿易港也。）與駛來之華船從事貿易，藉此獲得日本市場所需之物資，故會安一躍而成爲中日貿易之轉口地。

會安貿易之繁盛，促使中、日商客留寓當地者逐有增加。蓋阮主每年假會安舉行爲期四月之定期市，華商供應生絲及其他特產，而日商則携來大量銀貨採購，廣南國主開徵貿易稅獲得鉅利。

廣南國主爲方便商賈居留，特准華人及日人選擇一適當地點以建設市鎮，此鎮稱爲會舖（Faifo），其中有日人街及唐人街，兩街分置頭領，依據各自習俗生活。

作者根據明張燮《東西洋考》及明侯繼高《全浙兵制考》附錄中所提供之史文資料，斷定會安定期市之開設，當在阮潢開發廣南（一六〇二年）之後；而會安唐人街及日人街之創建，當在佛王阮福源執政期內。（按阮潢卒於一六一三年，其子福源繼任鎮守。）

當日會安唐人街之情況，作者摘錄數則富有價值之史文加以扼要說明，包括有一六五一年航抵會安之荷蘭船長菲爾斯得漢（Willem Versteegen）之日記及一六九六年英人寶依亞（Thomas Bowyear）致英印度公司之函件等，而最精彩之一段記述當屬一六九五年釋大汕之《海外紀事》。（按釋大汕於清康熙三十四年應廣南阮主之聘，赴越南說法，越歲而歸，因記其國之風土及見聞，而成《海外紀事》六卷，該書史料價值甚豐，見陳荆和著《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

日本岩生成一教授根據日文史料，推斷會安日本街之中心乃今日會安市日本橋（即來遠橋）一帶之地，而本書作者則力證其非。作者根據釋大汕《海外紀事》之史料及會安現存之中國廟宇所在位置，考證得昔日之大唐街即今日會安市之「日本橋街」，亦即日本橋以東之區域，而日本街則位於大唐街之東鄰沿河之地，此點爲本書作者創見之一。

會安之貿易季節通常配合農曆新年時間，本地居民携來交易土產如黑檀、麝香、肉桂、胡椒、米等，而華船及其他如葡、荷等國船隻則載來陶器、瓷器、紙料、茶、銀

塊、武器、硫黃、硝石、鉛、生銅及西洋雜貨等。

由於會安位置適中，最便聯絡鄰近諸國各埠，故各埠土產均以會安為集散地，而華商則以華貨與之交易，使返航時有充分回貨。在十七世紀末年，由中國港口往販廣南之華船，平均每年達六、七艘之多，約佔東南亞各地來廣南通商之外船總數十分之六。

居留會安之華人口總數，於一六四二年時約有四千至五千之數，一七四四年時增至六千人，至一七五〇年時竟激增至一萬人。上述人口數字均有史文可稽，足見中越貿易之飛躍發展。同時十八世紀初葉往販廣南之華船大增，膨脹至年達六十至八十艘之多，造成一七五〇年（清乾隆十五年）前後會安貿易之黃金時期。中越貿易之急劇發展，其主要原因有下列兩點：（一）分據越南南北之阮王及鄭王協議停戰，維持一百年和平共存之局，因此阮、鄭雙方不再迫切需要外援，從而對歐洲商人不表重視。（二）日本德川幕府立例限制華船入口，並緊縮貿易額，中日貿易大不如前，華商乃放棄日本市場，轉往南洋發展。

一七七三年（乾隆卅八年）南阮疆域內之西山（Tay-san）阮文岳兄弟（新阮）叛亂，北鄭、南阮難與抗衡，演變成爲佔據中、北圻之西山新阮政權與堅守南圻之舊阮復興勢力陷入長期內戰局面。越南大局遭此空前動亂，會安一地亦不免慘受戰火摧殘，商業貿易一落千丈，唐人街亦淪爲廢墟。

十九世紀之初，舊阮嘉隆皇阮福映終於擊敗西山政權，越南三圻重歸統一。會安經過一段時期之休養生息後，商業貿易漸恢復舊觀。可惜地理環境變遷，會安河道日漸狹淺，航運不便，先天條件不良，會安貿易隨即衰退。華僑相繼離開會安，遷往新闢之南圻西貢或中圻峴港（Tourane, Da-nang）繼續營商，會安往昔之繁榮終於一去不返。

第三章爲明香社之設立及其創建者與領導人物：十七世紀初期，留居會安之華人有三類：其一爲等待明年風季始乘船北返之「押冬」商客；其二爲自願作永久性或半永久性之僑居者，彼等多屬船主之經紀或買辦；其三爲長居當地之謀生者，如各類店舖店東、江湖客、難民、堪輿師、草藥商等。

及至十七世紀中葉，明室傾覆，滿清入關，奴役中華，頒佈薙髮令，朱明遺民相率亡命海外。會安人口驟增，難民充塞，原有房舍不足以收容衆多之華籍難民，因此遂有明香社之設。

作者考證會安明香社萃先堂之碑記，其中有「冠以明字，存國號也。」字句，獲知「明香」乃越南明遺民集中居住之村社名稱，其原意含有繼承明朝香火，亦即紀念明朝之義。後來「明香」一詞，在十九世紀之初方由阮朝改寫作「明鄉」。

明香社之設，始於會安，時間當在明朝覆亡之後，惟建立之確實年代，苦無史籍可稽。作者根據實地調查所得，發現會安關聖廟之匾額，題有「慶德癸巳年穀旦書，明香社員官各職同立。」字句，作者斷定該匾額乃記載「明香」名稱之最古史料。慶德為黎神宗年號，癸巳年為慶德五年，相當於一六五三年，故作者所下結論為：會安明香社乃越南最初之明香社，創立於一六四五至一六五三年之間，極可能在一六五〇年左右。

作者在本章中傾全力考證明香社先賢「十老」、「六姓」與「三家」之來歷與事蹟。一般海外華僑活動，在中國傳統歷史上並無地位，為中國史書所不載。故欲研究海外華人事蹟，表揚先僑事功，有待進行實地田野工作，從事各類社會調查以發掘資料，然後以社會科學觀點，配合史學研究方法，以追尋歷史事實，作者之研究方法大體遵循此一途徑。

越南現代史學家阮紹樓氏曾根據會安明香社之地簿及族譜等資料，以推斷相傳創建明香社之「十老」事蹟。但作者對阮氏之論斷，表示懷疑。「十老」初履越南之升平（Thăng-binh），後遷茶饒（Tra-nhiêu）、青霞（Thanh-ha），最後定居明香。作者引述釋大汕之《海外紀事》及《大南一統志》之史文記載，斷定以「十老」為代表之華人，彼等一再遷移，決非如阮氏所言，基於茶饒、青霞兩地河道之淤淺，而可能因為人口之增加或方便交易之緣故。

吾人尤應注意者，明香社萃先堂碑記中有云：「吾鄉祠奉祀魏、莊、吳、邵、許、伍十大老者，前明舊臣也。明祚既遷，心不肯貳，遂隱其官，卸名字，避地而南至……。」其間「十大老」與魏、莊、吳、邵、許、伍「六姓」之關係混淆不清，予人錯誤印象，以為此「十老」源出於「六姓」，其實「十老」與「六姓」並無關係。作者在會安考察華僑墳墓時，在明香社萃先堂墓地中發現一塊「萃先堂前賢鄉譜圖板」銘板，清楚刻有「十老」名銜，即「孔老太爺、顏老爺、余老爺、徐老爺、周老爺、黃老爺、張老爺、陳老爺、蔡老爺、劉老爺」。此外另有「六姓鄉耆老」名錄，即「魏、莊、吳、許、邵、伍」六姓，最後即為「三家」：其人姓氏依次為張宏基、吳廷寬及洗國祥。據此發現，所謂「十大老」者，絕非分屬「魏、莊、吳、許、邵、伍」六個家姓也。

作者繼探索「十老」事蹟，獲悉「孔老太爺」原名孔天如，一六九五年（清康熙卅四年）去世，其遺墓在會安錦庸坊。墓誌刻有「欽賜該府艚忠良侯」字樣，按孔天如任官「該府艚」，即在阮府任管理船務及對外貿易之官員，同時亦兼管僑居華人者。

又「周老爺」即周岐山，終於一六九四年，遺墓在會安山豐坊鄉亭園發現，墓誌題

「江南顯考恩授內院該府禮恩賜侯岐山周公墓」，可知周氏亦在阮府擔任「該府禮」官職。

至於「六姓」有遺跡可尋者，僅得青霞社之吳孕明遺墓及茶饒南之魏元餘與魏志鳳遺墓而已。

作者又訪問會安明香社周氏後人，知悉「十老」定居明香社，各有先後，並非生活於同時期之華僑，而「六姓」入居會安，則猶早於「十老」云。要言之，「十老」及部分「六姓」華人乃十七世紀後期會安明香社之僑領。「十老」與「六姓」之籍貫、方言均有不同，但「十老」身份為政府官員，而「六姓」者僅一介商民，乃明香社年高德劭之父老而已。

所謂「三家」者，當為十八世紀中葉會安明香社之富商僑領，一向熱心公益。「三家」之事蹟大畧可見諸一七五三年（清乾隆十八年）之會安明香社關聖廟重修碑記。書中對洗、吳、張三氏之家世源流，考證甚詳，茲不贅述。

第四章為寺廟與會館：作者將會安著名寺廟及會館一一臚列，其位置地點、歷史來源、供奉神祇、落成年代、重修經過及文物記載，均有詳細紀錄。廟宇中以關聖廟歷史最悠久，香火最盛。至於會館之設立，亦作供奉神祇之用，不失為一種地方特色，如中華會館及福建會館之奉祀天后、潮州會館之奉祀馬援等。

本章臚列之寺廟、會館、橋樑包括：（一）關聖廟與觀音寺；（二）錦霞、海平二宮；（三）萬壽亭、廣安寺、追遠堂、萃先堂、明香先祠（明香會館）；（四）文聖廟；（五）福建會館；（六）廣肇會館；（七）潮州會館；（八）瓊府會館；（九）中華會館（洋商會館）；及（十）來遠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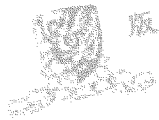
最後為附錄資料，所佔篇幅計八十七頁之多，而本書正文僅佔七十七頁。附錄刊載會安華僑社會之寺廟、會館、橋樑、墓穴之碑記、墓誌等原始史料，琳瑯滿目，資料豐富而翔實，誠為研究近代越南中圻華僑歷史之上佳史料；尤可貴者，除有碑銘之英譯外，尚附錄中文原文，以便讀者中、英文參照。

附錄之碑記、墓誌內容計有：（一）會安明香關聖廟重修碑記（I）；（二）會安明香關聖廟重修碑記（II）；（三）會安明香關聖廟重修碑記（III）；（四）會安明香關聖廟重修碑記（IV）；（五）會安明香關聖廟重修碑記（V）；（六）廣安寺碑；（七）錦霞、海平二宮碑記；（八）洋商會館公議條例；（九）重修頭門埠頭碑記；（十）重修會安中華會館碑記；（十一）會安福建會館石碑（I）；（十二）會安福建會館石碑（II）；（十三）福緣善慶：會安潮州會館碑記（I）；（十四）會安潮州會館石碑（II）。

館碑記(II)；(十五)會安廣肇會館石碑；(十六)會安瓊府會館碑記；(十七)明香社萃先堂碑記(I)；(十八)明香社萃先堂碑記(II)；(十九)會安明香社文聖廟碑記；(二十)重修來遠橋記；(廿一)重修鄭吳氏墓誌；(廿二)孔天如墓誌(在會安錦廂坊)；及(廿三)古墓碑：1. 明海和尚；2. 鄭吳氏；3. 吳孕明；4. 梁林氏；5. 周岐山；6. 郭儒友；7. 魏元餘；8. 魏志鳳；9. 黃成祖；10. 萬；11. 李梅氏；12. 冼王氏；13. 雷逢春、謝進生；14. 林緒興；15. 袁利；16. 李榮官；17. 善志和尚；18. 惠鴻和尚；及19. 劉五店、高光官。

本書之末附會安地圖；會安風土人物之寫真畫四幅；會安古蹟如橋樑、寺廟、會館之照片十六幅等，亦具歷史價值。

余 煒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